

当代美国 哲学论著选译

第二集

商务印书馆

15.63/
TJ2
22

有译

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第 二 集

涂 纪 亮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DĀNGDÀI MĚIGUÓ ZHÉXUÉ LUÈNZHÙ XUǎN YI

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第二集

涂纪亮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9-00101-3/B·9

1991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6 千

印数 0-2 000 册

印张 10 5/8

定价：3.20 元

目 录

宗 教 哲 学

尼布尔, 莱因霍尔德(1892—1971)	(4)
自我与历史的戏剧	杨真译 (6)
阿德勒, 莫蒂默(1902—)	(32)
认识和非物质性	齐良骥译 (34)
概念思维的非物质性	齐良骥译 (50)

存 在 主 义

蒂利希, 保罗·约纳内斯(1866—1965)	(63)
存在主义哲学: 它的历史意义	涂敏译 静之校 (65)
勇气和个性	边宜译 涂纪亮校 (87)
怀尔德, 约翰·丹尼尔(1902—)	(112)
存在主义的挑战	涂敏译 静之校 (114)
人的概念	周鹤译 希宪校 (145)
巴雷特, 威廉(1913—)	(167)
存在主义的出现	熊伟译 (168)

人 格 主 义

伯托西·彼特·安东尼(1910—)	(191)
目的论人格主义唯心论者的观点	辛少征译 姚介厚校 温锡增审 (192)
为形而上学的创造概念辩护	齐音译 温锡增校 (227)

沃克迈斯特, 威廉·亨利(1901—)	(246)
价值理论问题	姚介厚译 秦麟征校 (247)
价值理论和道德义务问题	吕大吉译 温锡增校 (272)

现 象 学

法伯, 马文(1901—)	(282)
第一哲学和世界问题	范明生译 静之校 贺麟审 (284)
现象学的价值观	范明生译 涂纪亮校 贺麟审 (316)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330)

宗 教 哲 学

尼布尔，莱因霍尔德

(Niebuhr, Reinhold 1892—1971)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的倡导者。

尼布尔1892年6月21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赖特市。1915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被北美福音教会任命为牧师，开始在底特律市汽车工人中间传教。1928年，他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授，讲授基督教社会伦理学，直至1960年退休。二十年代，他积极宣扬自由主义神学，从事社会福音运动，在政治上支持自由主义纲领，参加美国社会党。30年代初，他对自由主义神学的态度从怀疑走向反对，并一度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他是从基督教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30年代后期，他的思想开始向右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敌视态度，1940年退出美国社会党，组织“民主行动联盟”，从事政治活动。

尼布尔的主要著作有：《讲求道德的人和无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年；《对时代末日的沉思》(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an Era)，1934年；《基督教和强权政治》(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1940年；《人的本性》(Human Nature)，1941年；《人的命运》(Human Destiny)，1943年；《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Children of

Light and Children of Darkness), 1944 年;《信仰和历史》(Faith and History), 1949 年;《对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1952 年;《基督教实在论和政治问题》(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1953 年;《自我与历史的戏剧》(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1955 年。

自我与历史的戏剧*

第十章 自我与历史的戏剧

自我被卷入与他人的各种对话，当导致行动时就变为人生的戏剧。这些行动构成戏剧的模式，它交织成个人命运的蜘蛛网，并决定他以后的行动和对话。这些戏剧性的模式也可推广到不同的家庭、地区社会以至国家。它是历史现实的各种表现，在其中，自由和必然的对比成份不断地变化。最明确不变的是自然的必然性，例如，影响人的集体生活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以及个人的性别、年龄。但是，在历史中也有一些几乎与自然界同样明确可知的常数，而它们却只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之下，例如由文化“特性”而来的一些常数。

上面所说戏剧性的模式包含着因果顺序，可以相当准确地进行分析。人们不仅能判断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判断它们何以会发生。但是，这种答案必定属于思辨性质，因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每一个事件都牵涉到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因此，对某一个事件，我们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出它的“真实”原因，甚至也无法精确估计它的主要原因。而且，对历史所作的分析并不能确切地类比应用到相似或相反的情况。因此，对历史模式的分析必然缺乏

* 《自我与历史的戏剧》(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一书，1955年出版于纽约。——译者注

自然科学结论中所特有的精确性。总之，历史不象任何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预测。

历史模式是现实之中不能与自然界结构等同的一个范畴。两者必须严格区分，因为历史模式是自由与必然的某种混合物。

全部历史就更加复杂，因为在其中一种历史模式层叠在另一种历史模式之上，例如，在文化模式之上又有民族历史的模式。谁能确定地回答：美国究竟是否卷入了被称为“西方”文化的历史？或者认为美国历史的特定条件、我们的处女地、我们横贯北美大陆的经济、我们的多民族人民和蓬勃朝气就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文化的命运分开？

正因为历史的因果联系无限复杂，历史戏剧的各个场面层叠在一起，造成眩目的混乱，所以任何科学家、哲学家要用自然或本体的必然性去概括历史中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无数主题是不可能的。当然，确实还有社会或历史科学。然而历史科学家必须认清自己是历史家而不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所作的历史概括是一种冒险的思辨。真正的历史家甚至本能地知道历史的特殊性，知道预测未来是一种冒险。由重农学派的幻想中兴起的经济学，后来日益认识到，预测未来时必须考虑无穷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因此，经济学家们已经变得日益谦逊起来，而其它部门的社会科学家却还背着重农学派留下的包袱，幻想一大堆所谓“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把要考察的历史事实归结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或历史条件下始终一致或循环往复的个人行为，例如青少年的思想、复原病人的思想、工人或农民的行为、城市生活的条

件、家庭生活的寄宿舍化等，这样，就可以极为“科学地”对待历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统计数字来支持某种结论，也可以把固定不变的行为与随历史条件变化的因素区别开来。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预测也难免不准确，有时是因为难以预料的人的自由，而更多是因为未曾充分考虑到环境条件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常常失败，这是因为抽选作为典型调查对象的人是由电话簿上拣选的，他们的政治倾向并不能代表各个社会阶层。现在，社会调查的选样典型挑选得比较合乎科学，考虑到社会中不同经济或其它利益集团所特有的偏见。但是，任何科学也不能预见密歇根州的某一个祖籍波兰的工人在投票时究竟将遵循产联的流行意见，或是根据他个人是否满意本届政府为弄清战时波兰卡庭森林中集体屠杀事件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果要对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同一阶级的集团做出概括性的结论就更为冒险。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多么荒诞无稽。它错认为各国的产业工人都同样穷得一无所有，并把他们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毋庸置疑，资产阶级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较，有其不同特点。但是这种概括又怎能把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产阶级的不同条件都考虑进去呢？

无论如何，对人们过去行为的科学调查并不能据以预测他们将来的行为。即便一个历史家能在事后弄清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是对过去的概括并不能据以预测未来的行动与事件。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家对过去事件的复杂原因不可能完全了解，而且因为他无从判断，在决定个人与国家生活的

各种力量与倾向中，哪一种将起主导作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中，只有雅各布·伯克哈特预言二十世纪将出现暴政。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马克思关于地上天堂的梦想最后竟化为一场噩梦。马克思如果活到今天，也会为当代的现实惊愕不止。这些令人惊愕的历史事件否定了一切企图以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解释历史戏剧，以为头绪纷繁的历史戏剧可以归结为赋与它某种简单的意义。

如果人们以分析同一条条件下行为的一贯性作为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则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就生动地表明了历史多么富于戏剧性，决非科学分析所能概括。当代杰出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的性格如何由于客观需要而逐步发展，直到他在决定历史命运的关头，以富于个人特性的方式对史无前例的事件作出独特的反应。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某些“个性”是由于他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有一些“个性”是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他与张伯伦个性不同，一部分是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他一生的道路在某些方面是因为他属于马尔博罗公爵家族却又不是公爵的嫡系后裔。马尔博罗公爵家族是不引人注目的乡村绅士。丘吉尔是公爵次子所生，因此在长子世袭贵族的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无疑激发了他的雄心。他的父亲的地位是否决定了他的一生？或者由于他父母专务其它，对孩子不关心，决定了他的一生？如果丘吉尔不是那样天赋过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湮没无闻了。可是，丘吉尔并不埋怨他的父母，相反地，倒激发他要为忽视他，又受他崇敬的父母争光。我们可以把影响丘吉尔生平这类因素继续列举下去。至于这些因素之中，哪些重要，哪些

次要，纯属思辨分析性质。从分析丘吉尔的先人入手，无从回答，他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何以未曾招致个人野心往往带来的失败。丘吉尔在评论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的可悲生平时说道：“孜孜追求个人利益多么空虚徒劳！”为什么这个评论在丘吉尔自己身上就不适用呢？在丘吉尔这个具有雄韬大略的勇士身上，怎样会产生出罕见的宽广胸怀呢？对丘吉尔或其它伟大人物提出的这类问题都难以“科学地”解释，就是说，无法运用理性的因果关系得到必然如此的结论。写传记是一种艺术。它与绘画相似。摄影这门科学终究不能取代绘画。摄影能够抓住人的瞬间的面部细微表情，而绘画却能画出在瞬间表情背后的性格特征。历史比传记更接近于一门科学，因为它能够把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从各种似乎是独特的事件中找出共同的趋向。但是，历史编纂学永不可能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真正的历史家深知这一点，故而宁愿让某些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去鼓吹这种幻想。

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关于历史形式与自然形式的进化的现代科学知识，当时一般以为自然与历史的结构都是固定不变的，然而他却把那种分析“不变因素”的科学和那种处理人生历史中偶然因素的“实际智慧”严格区别开。事实上，我们必须最严格地区分在现实的固定结构中形成与消逝的过程和整个人类历史领域，它的顶点便形成传记。在这领域内有一个从属的方面，其中事物象儿童必须经过青年时期才能达到成年一样，要遵循必由之路。

自我所拥有的完全自由及随之而来的戏剧性的历史现实显然使任何想了解并掌握历史的科学努力都极为困难。因

此,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一种倾向力图压制与个人自由有关的事实,而强调能“决定”个人行动与命运的那些事实。历史中确实充满了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例如地理与气候条件、社会与经济条件、环境与遗传条件,等等。由此产生了社会学与心理学中各种各样的决定论,它们否认有关人与其历史的明显“事实”,说是为了“科学地”理解人与其历史。这种“科学”有时无非意味着“经验主义”。

科学家们试图把形形色色的事实与细微的模式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式之中,这时不免产生一种要想歪曲事实的冲动。哲学家们和本体论者试图寻求较大的历史模式的意义,藉以赋予整个历史戏剧以某种意义,也难免遭到类似的诱惑。的确,使人眼花缭乱的歷史戏剧如此无穷无尽,令人感到困惑,而艺术则把各种历史的戏剧称作悲剧或喜剧,为的是给历史的戏剧以某种可以理解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实事求是的历史家本能地感到哲学家们声称他们在变幻不定的历史之中、之上及其背后发现一种更大的本体的模式未免过于狂妄。伟大的历史家 H. A. L. 费希尔在他的《欧洲史》序言中说:“智慧学识在我之上的某些人看出历史之中有图样、有节奏、有预定的模式。我却未能看到这些。我只看见一个接一个的突然事件,如同后浪催前浪。我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无法概括的巨大独特的事实,即历史家们唯一稳妥可循的法则是:确认偶然的、难以预料的因素推动着人类命运的进展。”

从哲学角度去理解历史,总是先有一个假设,即在现实的深处有某种模式,在其中那些“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因素实

际是“必然性”的形式，表明一切事物都有潜在的逻辑，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西方文明史上，有许多理论试图从本体论来理解历史；这些理论不外乎两类：(1)古典的历史循环论观念；(2)现代的历史发展论观念。现代的历史发展论从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到被认为摆脱了形而上学，讲纯粹科学发展观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有这些“进步”的观念都反映了现代人的历史乐观主义。它们或是披着形而上学外衣，或是披着科学外衣，成为现代人的宗教。现代人力求能把人生纳入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框框之中，这样他的人生也就有了意义。

历史循环与历史进展这两种观念实际上确认了历史中的两个基本事实。历史循环观念反映了参与历史长流之中的有机体的出生、成长与死亡。国家、文化与文明不是有机体的生命体，不象生物机体的生命有一定时限，因此，把历史周期与生物周期相比拟的古典观念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日趋明显是由于历史进展观向亚里士多德的历史结构固定不变观提出了挑战。但是，历史有周期循环的这种观念还包含有许多真理，因为历史的文化、文明、社会也是会死亡的，尽管它们的衰朽死亡并不是天然所决定，而往往有一部分是由于人的错误所造成。

现代的历史进展观与历史循环观一样有其正确的方面，也有谬误的方面。它的正确方面是：它符合历史的一个明确事实，即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这为历史提供了基础。这种发展贯穿着各种文明兴衰的过程。它集中表现为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历史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改变了社会内部结合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手段,因此可以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而武器的改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则出现了今日可怕的热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如此突出引人注目,助长了今日时代“进步”的幻想。但是现在日益明显的是,人虽然能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却未能改变人与生俱来的心灵或智力,也改变不了人在历史中既是创造者又是受造之物的地位。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能从本质上改变历史的戏剧,使它沿着可以预见的道路发展。

由此可见,历史循环与历史进展这两种模式不过是历史舞台的广阔与纵深这两个方面。它们只是从反面帮助人理解历史。而一旦赋与它们以正面的意义,就将造成混乱。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力图赋与历史循环某种积极的意义。他们的努力表明,要把历史戏剧纳入循环的模式虽属可能,却有一定限度。历史戏剧中变幻无穷的主题层叠在历史循环圈之上,而且它们的出生、成长与死亡并非由于自然循环的必然性,而是由于人的无能与失败。因此,历史循环的周期不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每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死亡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死亡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生命。这至少是一个理由来论证历史的周期不同于生物的周期,从而表明对历史的戏剧可以赋与某种积极的解释。

同样也可以说,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的生长并不相同。历史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于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而不是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发挥作用,也不是由于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晦涩的历史辩证法在起作用。无论是称之为“科

学的”或“哲学的”进步观念都掩盖了人生戏剧中变幻无穷的自由与必然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历史在发展终是事实。过去的问题，如社会组织的规模，今天在更大的范围、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再现。但是，历史的“进展”并不能保证这些日益广泛复杂的问题必定得到解决。历史的前进运动并不能较之历史循环论赋与历史以更多积极的意义。两者都只是描述了历史戏剧的条件，却并非历史的模式。

第十一章 历史知识的问题

每当我们考察历史戏剧时，就会看到，不仅这个领域充满了偶然性，以致难于找出一个“真正真实的”结构或模式，而且考察历史的人本身也深深卷入到历史洪流之中。历史家对矛盾的问题维持一定距离，极力保持“科学的客观态度”，可以使他对所阐述的事件相对地置身局外。但是任何人考察历史时也不可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抱纯客观态度，得出完全不容置辩的真实结论。

因此，历史知识是否可靠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人们不禁奇怪，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任何不包含逻辑或数学真理的命题，不能“科学地论证”的结论一概抱怀疑态度，何以对关于事件的历史时序的各种命题之暧昧性却不予注意。事实上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全能的科学，我们只得听任历史家们顺从自己无常的意识形态立场去报道和解释历史事件。诚然，我们不难批驳极端的偏见，也可以分辨真正的历史家与明显的宣传家，然而要把真正的历史与宣传